

空間的不可測與生命的不確定

黃鳳祝

凱曼嘗試通過對歷史的漫畫，把海森堡的「測不準原理」和庫恩「科學革命的結構」，帶入十八世紀的啓蒙時代：在現代性的開端就蘊含了其反面——後現代的不確定性。理性作為測量世界的科學工具，由於建立在錯誤的空間理論上，導致真理變成了幻覺。

德國青年作家凱曼 (Daniel Kehlmann, 1975-) 的小說《測量世界》(Die Vermessung der Welt)，無疑是近年最成功的德語文學作品。自二〇〇五年德文版面世以來，該書已被譯為四十二種文字。按照美國《紐約時報》公布的資料，《測量世界》二〇〇六年全球銷量第二。截至二〇〇九年九月凱曼的另一部新作面世之前，《測量世界》僅德文版就已發行了近兩百萬冊。在德國的幾個聯邦州，該書被列入高中生的必讀書目。

擺脫當代德國文學的「罪」

戰後的德國文學，如果以當代德國為主題，總是難以擺脫集中營、大屠殺和廢墟的記憶。凱曼本人也具有猶太血

統，他的父親因參加奧地利抵抗運動，曾被關入納粹集中營。但是，凱曼的文學視野選擇了跨越。他以古典主義時代的德國作為切入點，對「當代德國人」的心理狀態進行探討，由此擺脫了當代德國文學背負的沉重罪贖感。普魯士科學家洪堡 (Alexander von Humboldt) 和高斯 (Carl Friedrich Gauss) 是小說的兩個主人公。凱曼把歷史人物和事件作為小說敘事的素材，構建了一個德國精英成長和老化的「漫畫世界」。在「漫畫」化的世界中，脫去道德的偽裝與束縛，人們得以對德意志民族的認同問題進行自由的反思。

發，到南美去探險，但是實地考察的結果最終推翻了「洪積論」。要推翻老師的理論，洪堡有些悵然。高斯是個數學天才，厭惡旅行，對於數學、天文學和測量大地之外的事情一概沒有興趣。高斯鄙視人文科學，對於歌德的顏色學研究不以為然。高斯推翻了歐幾里得的空間理論，提出空間彎曲論，並與康德探討空間問題。

德意志化與年華老去

在《測量世界》這部小說中，凱曼想要表達兩個主題：德意志化和年華老去。

凱曼筆下的洪堡在國外探險期間，喜歡穿着普魯士軍隊的制服，彰顯德意志的民族性。身在異域，洪堡處處顯示自己是個德國人。這種希望被

認同的心理，隱藏了一種對領袖的渴望。普法戰爭期間，這個帶有一半法國血統的德國人，留在巴黎從事研究，沒有為保衛祖國的戰爭盡力。這顯示了洪堡「民族心理」中矛盾的一面。在小說中，凱曼對洪堡這種「民族主義」的心態予以諷刺。在他看來，洪堡這種尋求德意志民族認同感的表現，在旅居海外的德國人中是一種普遍的心態。基於二戰期間的納粹暴行，許多德國人或或多或少都帶有一點「集體的民族罪贖感」，德意志民族的優越感因此受到壓制。德國人在批判納粹時，總是有意迴避德意志民族的認同問題。

年華老去的問題蘊含着關於生命的另一個主題：熵 (Entropie) 的問題。凱曼認

為，存在的最大不幸不是死亡，而是年老。年華老去是一個熵累積的過程，這個過程是不可逆轉的。年老意味着生活中「無序」的增長。人在成長過程中，積累的東西越來越多，無力割捨；隨着年齡的增長，人建立的關係也越來越複雜，人情和債務越來越沉重。年老意味着生活無法簡化，人需要花費更多的精力，處理生活中瑣碎的雜務。年華老去意味着人的生活秩序趨向混亂和生命的不確定。

德意志化和年華老去這兩個主題其實是另一個主題的衍生，即德國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關係問題，也就是自海森堡（Werner Heisenberg）提出「測不準原理」之後，德國知識分子圍繞「後現代性」問題的爭論。

漫畫世界的測量技巧

在《測量世界》中，康德、歌德、席勒、威廉·洪堡（Wilhelm von Humboldt）等啓蒙時代的歷史人物，變成了作家筆下漫畫式的人物。這種漫畫有時是一種諷刺，有時是

一種幽默，有時是對歷史的嘲弄。小說的敘事以普魯士政府壓制民族主義和民主運動為背景，跨越法國大革命和普法戰爭。法國大革命最終成就的不是其所主張的自由、平等和博愛，而是拿破崙帝國的專政。

凱曼在《測量世界》中要表達的是理性的不確定性。一個混亂的世界，是不確定的、不可測量的世界。凱曼認為，自從人類發現量子力學後，在觀察微觀世界時，敘述「客觀真實性」的可能性就很難「客觀」地存在。世界中不再存在客觀的「因果關係」，人的知性（理解能力）不再具有理解宇宙的能力。因果關係的失效，導致世界的不可知。人是自由的，不再是命定的，但世界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，人是一個不確定的人。人也許可以測量、計算世界上的一切，但不能真正理解這個世界。

凱曼借助高斯的時空理論，對康德《純粹理性批判》提出了質疑。康德的主體性理論建立在歐幾里得幾何學的基礎之上，但是歐幾里得幾何學的正確性，從未得到證實。歐

幾里得的幾何學一旦被推翻，康德有關主體和時空的理念就失去了理論的支柱。

不自由的自由主義者

自然的進化與社會的「進步」是無情的，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。當代學術範式的交替並非建基於理論的創新，而是基於自然的淘汰：老一代科學家步下歷史舞台，新一代科學家才能崛起。學者為了維護本集團的利益，必然會為自己的信仰進行非理性的辯護，排斥新的理論。他們追求的並不一定「真理」。歌德希望洪堡在南美的地質測量和研究，能夠為自己主張的「洪積論」提供依據。但是事與願違，洪堡的研究推翻了歌德先驗的科學理念。洪堡作為魏瑪知識圈中的一分子，對於自己的新發現感到惆悵和傷感。他背離了師長的意願與託付，陷入了感性與理性的矛盾之中。洪堡是一個信仰自由的人道主義者，但是他的科學研究在精神層面上受到康德和歌德思想的規範，在政治上受到普魯士、拿破崙、沙皇和殖民獨裁者的制

約，因此洪堡只能是一個不自由的自由主義者。為了從事科學活動，自由主義者不得不依賴強權與暴政，這是漫畫世界中可悲的一幕。

現代性的特徵是相信主體的自由與科學的確定性。在資本社會中，主體自由表現為主體受司法保護的自由，主體可以「合理」地追求自己的利益；在國家範圍內，個人有平等參與構建政治意志的權利。這種理念只是一種先驗的信仰，是笛卡兒、牛頓和康德啓蒙理性的一種形而上學。凱曼嘗試通過對歷史的漫畫，把海森堡的「測不準原理」和庫恩（Thomas Kuhn）的「科學革命的結構」，帶入十八世紀的啓蒙時代：在現代性的開端就蘊含了其反面——後現代的確定性。理性作為測量世界的科學工具，由於建立在錯誤的空間理論上，導致真理變成了幻覺。

（作者是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、歐洲詩學與文學研究所所長。